



中国新文学
批评文库
贺仲明\李遇春\主编

走向实证的 文学批评

李遇春
／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014034345

I206.7-53

66

走向实证的 文学批评

李遇春 /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北航

C1722382

I206.7-53
6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向实证的文学批评/李遇春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4. 4
(中国新文学批评文库)

ISBN 978 - 7 - 218 - 09164 - 8

I. ①走… II. ①李…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4204 号

Zouxiang shizheng de wenxue piping

走向实证的文学批评

李遇春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曾莹

出版策划: 肖风华

责任编辑: 肖风华 古海阳

装帧设计: 礼孩书衣坊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ph.com>

印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 - 7 - 218 - 09164 - 8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0.75 插页: 2 字数: 290 千

版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 - 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0604 83791487 邮购: (020) 83781421

总 序

当前社会中，文学批评的形象已经不是那么光彩。作家在质疑批评家的严酷和片面，读者在怀疑批评家的诚信，批评家自己也不满现状，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反思的声音。这种状况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也与当前文学的整体处境有密切关系，但文学批评自身的因素是最重要的。如何恢复批评家的形象，让文学批评发挥正常功能，在文学活动中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很值得深入的思考，以及批评家们的身体力行。

在我们看来，文学批评所涉及的内涵当然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也是当前文学批评最需要加强的，是这两个方面：

一是批评的气度。所谓气度，就是要有胸怀和高度。文学的发展非常迅速，面对文学的变化和多样性发展，不是墨守成规，故步自封，以封闭的僵化的眼光去看待，而是立足于广阔的视野，以发展的姿态来认识。批评的胸怀是与批评者的思想高度相密切关联的。只有拥有对文学的深刻认识，从历史的高度来看待现实，才可能不被现实所遮蔽，能够全面、客观地看待现实，看待文学中的潮流和变化。

二是批评的力度。批评有胸怀不是无主见、做乡愿，相反，它需要思想的独立性，需要批判精神。这就使它与批评力度结合在一起。文学批评不是廉价歌颂，不是讲人情，它最终的负责对象是文学，是我们的时代。因此，文学批评不应该有太多的顾忌，不应该考虑文学之外的人情、政治和商业等因素，应该在坚持自我的前提上，显示出自己的观点，彰显自己的力量。

文学批评的气度和力度各有侧重，但又密切关联，相互补充，共同构成着良性文学批评的重要特征。就当前文学而言，无论是被众多作家诟病的酷评，还是深为读者所反感的商业批评、人情批评，都与这两方面的匮乏有直接关系。

当然，要做到文学批评的气度和力度并不容易。它需要有主观和客观

两方面的要求。从主观方面来说，批评家要有较好的自身修养。对文学的认识、见解需要对而有深度，而且对文学历史、文学理论也要有较深的造诣，能够认识和把握到文学的某些规律和审美特征。而且，更重要的是，批评家要有很好的的人格素养。有坚定的独立性。因为在当前社会，政治、经济、人情等因素严重地渗透到文学活动中，如果没有独立而坚定的人格素养，很容易随波逐流，甚至沦为权力、金钱或人情的奴隶。只有精神的独立，才能保持批评的独立。

在当前文学体制中，身处大学校园的所谓“学院批评家”应该具有某方面的客观优势。因为他们身在大学，不隶属文学体制之内，可以与文学体制、文学编辑和作家保持一定的距离。比较起文学体制内的批评家，学院批评家显然可以少受一些限制和掣肘，拥有更广阔的空间和更自由的发言权。

当然，这些都仅仅只是客观条件而已。对于当前的文学批评家来说，更重要、也更艰难的还是主观条件。姑且不说文学审美和文学历史方面的较深素养，即说精神的独立性，在现在这样一个“地球村”的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即使在大学校园中，要真正保持独立精神，也是相当困难的，需要批评家们自身持续不懈的人格修养。

而且，在学院内，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体制钳制，它们也会对批评家的创造性、独立性构成限制和伤害。另一方面，学院批评家也不能完全局限在学院之内，在与文学现场相隔膜的背景下闭门造车，因为文学批评也需要有文学现场感，需要了解和跟踪文学的动态，与社会相发展，否则就会影响文学批评的准确性和鲜活感。学院内的批评家要做好文学内与外、出与入之间的平衡，是一件需要仔细斟酌的事情。

出于对学院批评的期待，也出于对当前文学批评整体上的补正，我们与广东人民出版社组织了这套由学院内部文学批评家为作者队伍的文学批评丛书。相对而言，这些作者具有较好的文学史意识，能够站在比较客观的立场上来看待文学。也就是说，他们应该具有了文学批评气度和力度一定的基础。当然，这些批评是否具备了真正的气度和力度，还需要读者去检验和评判——对于文学批评来说，它最可靠的检验者只能是读者，是未来的文学史。

主编谨识

2013年9月10日

目 录 CONTENTS

卷首

走向实证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 / 2

卷一

文学史新观察 / 19

符号的行旅

——中国当代文学中土地话语演变的一个历史轮廓 / 20

六十年代初历史小说中的杜甫形象 / 33

走出“文革”叙事的迷惘

——从阎连科和刘醒龙的两部长篇小说谈起 / 48

新时期文学中移民叙事的演变 / 61

文学史前史的建构

——关于“编辑与八十年代文学”的思考 / 72

卷二

革命年代的文学蜕变 / 85

话语规范与心理防御

——论丁玲在延安解放区时期的小说创作 / 86

作为话语仪式的忏悔

——何其芳延安时期的诗歌话语分析 / 105

在“现实”与“规范”之间

——贺敬之文学创作转型论 / 118

一种新型的文学话语空间的开创

——重读贺敬之的红色经典 / 132

“多”与“一”的诗学辩证法

——贺敬之诗学品格论 / 150

一个“联对梦”小说文本

——《北极风情画》与《塔里的女人》解析 / 167

卷三 变革年代的文学突围 / 181

告别与寻找

——关于张一弓小说的话语转变 / 182

从“消解历史”到“发明传统”

——成一“晋商小说”论 / 195

乌托邦叙事中的背反与轮回

——论格非的《人面桃花》三部曲 / 210

心理现实主义与女性写作

——乔叶小说创作论 / 226

入围·围城·突围

——对张欣“新都市小说”的一种解读 / 244

卷四 聚焦文学鄂军 / 255

新时期湖北作家底层书写一瞥 / 256

新时期湖北作家的底层叙述与底层意识 / 268

庄严与吊诡

——刘醒龙和他的长篇小说《圣天门口》 / 283

破碎的英雄与英雄的破碎

——论邓一光“兵系小说”中的英雄系列 / 2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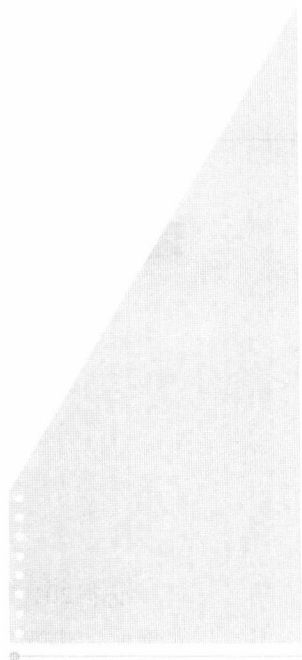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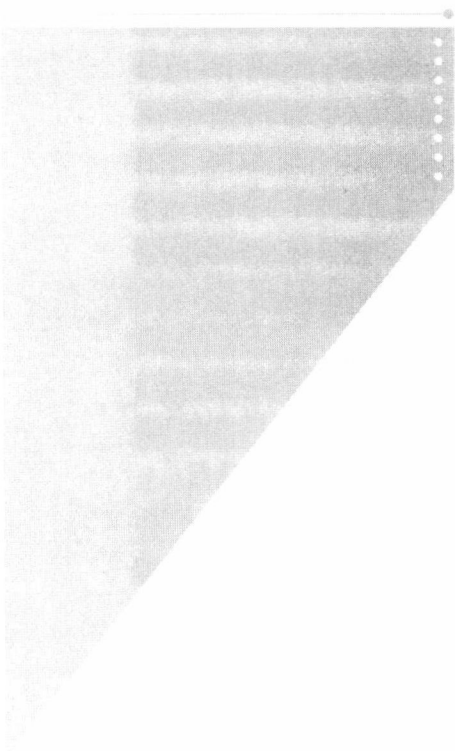
人在圈套中

——晓苏近年来的“大学校园小说”漫评 / 309

卷尾

实证是文学批评有效性的基石 / 322

卷首



走向实证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

记得2010年《南方文坛》邀我加入他们的知名栏目“今日批评家”的时候，我就在“批评家点睛”的短文里坦陈过自己作为批评家的尴尬和无力。回想起来，我涉足当代文学批评也有十好几年了，尽管近年来我把许多精力投入到了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中，这固然是出于我对当代文学批评的倦怠，其中也隐含了我的文学史观的自我调整，但说实话，即使是在潜心研究旧体诗词的过程中，我始终还是无法拒绝当代文学批评的诱惑，这就是当代文学批评的魅力之所在！毋庸讳言，如今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口碑不佳，但正所谓爱深恨切，我才愿借《文学教育》的这个栏目谈谈我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些想法。在这个到处都是学术论文中国制造的年代里，我不想写一篇引经据典的高头讲章，我只想说自己的心里话，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话怎么说文章就怎么写，类似于我的老师於可训先生最近常说的“口述文”。当年胡适之说“要须作诗如作文”固然有点过，但改成“要须作文如说话”，语浅意深，我觉得还是足以为后世法的。

一、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正名或辩护

我在上大学时读的不是中文专业，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才转行做文学研究，最初涉足的就是当代文学批评。入行后才知道在全国的中文系或者

文学院里原来一直流行着一种颇有黑色幽默意味的说法：搞文学理论的，瞧不起搞文学史的；而搞文学史的内部，搞古代文学的又瞧不起搞现代文学的，搞现代文学的瞧不起搞当代文学的……好像洪子诚先生的《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里也有过类似的说法。看来全国的文学院都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到处都在流行着这种学科等级制。本来，不同的一级学科之间就有各种等级之分，而在同一个学科内部则潜存着更森严的等级制，这中间该隐含着多少成见陋习，隐含着多少占山为王式的学术山大王气息，我想是毋庸讳言的。显然，当代高校里的学科建制有很大的问题，且不说人为地造成了知识的条块分割与断裂，大家各自守着自己的一亩学术三分地过着小国寡民的日子，单就这种隐形的学科等级制而言，又不知道要造成多少无谓的学科矛盾与争斗！而在这种学科等级制中，中国当代文学批评长期被压制在学术的底层，搞评论被很多人认为是没有学问的，只有搞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才是做学问的正道。我个人觉得这也是导致当代文学批评日渐衰微不振的重要原因，因为在主流学术圈得不到承认和接纳，所以当代文学批评界的批评精英日益流失，许多人都金盆洗手不干了，把精力转而投放到文学史、文学理论甚或其他与文学不搭界的领域。在这方面笔者有着切身的体会，我也曾因此而对自己有过怀疑并主动转向，但如今回过头来看，我却要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做些必要的澄清或者说是辩护。

首先要说的是，我以为在通常所谓文学研究的三个组成部分中，文学理论、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三者之间的学术地位应该是平等的，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所以如要重振当代文学批评的风气，打破这种人为制造的文学学科内部的等级制是必需的。在我看来，一个理想的文学研究者，他不应被现行的学术体制塑造成为一个学术上的单面人，而应该同时练就三般武艺，把文学理论研究、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实践结合起来。这并非好高骛远或者好大喜功的提法，而实在是我们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内心深处无法拒绝的一种学术境界，虽然一般人很难达到这种境界，但有境界的人与没有境界的人相比肯定是大不一样的。我不认为从事当代文学批评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的专利，尽管建国后的学术体制导致这已经成为了一个既定的事实。想想民国时期的大学学者，成功地游走在文学理论、文学史

和文学批评之间的人不在少数，许多大家都超越了我们今天所谓的学科壁垒，这才有了那个时代中国文学研究乃至整个民国学术的辉煌。胡适是文学革命的急先锋，可他不仅写了大量具体的文学批评文章和政论文，积极介入社会焦点问题，而且对新文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比如新诗的理论建设之类做了深入的思考和提炼，他的长文《谈新诗》至今都是研究现代诗论无法回避的重要理论文献。至于胡适的古代文学史研究和古代哲学史研究，虽然都只留下了半部书稿，但他的历史癖是出了名的，他从历史研究中总结出来的方法论至今还为后人津津乐道。所以，在胡适那里，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三者之间是融合的，主观上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至于他在三者之间游走并未臻达那种融会贯通的境界，那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有距离的，我们不能苛责前贤。翻翻《鲁迅全集》，文学理论、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三者之间也是合一的，尽管鲁迅先生在文学理论方面和胡适一样，尚未建构出独特的思想体系来，但两位现代文学大师的文学研究境界或学术境界是相通的。鲁迅和胡适是如此，其他如周作人、朱自清、闻一多、朱光潜、梁实秋、李健吾、李长之诸名家巨擘，无不皆然。他们或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为主业，或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美学、哲学，乃至外国文学研究，但他们都不曾放弃甚至可以说是热衷于文学批评实践。这其中道理何在？我想主要在于观念上他们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文学研究制度（等级制）的束缚，他们没有人为地割裂文学理论、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三者的关系，更没有厚此薄彼的学术偏见，由此铸就了他们不仅是作为作家的辉煌，而且是作为学者的辉煌。可见轻视文学批评确非明智之举。

为文学批评正名之后，接着我要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辩护。长期以来，搞现代文学的瞧不起搞当代文学的，主要原因是在现代文学研究者看来，当代文学研究够不上学问档次，不过是文学批评或评论而已。乃至在现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二级学科中，“当代文学”往往会被省略掉，径直接用“现代文学”把“当代文学”给吞没了。对此我们可以做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既然“当代文学”是“现代文学”的历史延续，为了强调中国新文学的整体观或者“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性，当然可以把“当代文学”纳入或兼并到“现代文学”之中，这种打通现当代文学内部

学科壁垒的做法当然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这就如同古代文学学科内部也应该打通所谓上古文学、中古文学与近古文学之间的学科壁垒一样，如此才能融会贯通，避免学术上的画地为牢。但还有另一种理解，认为“现代文学”的概念不能兼并“当代文学”，因为从文学形态学上来看，“现代文学”对应的是“古代文学”，二者之间构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话语转型或文学断裂，而“当代文学”并非一个文学形态学的概念，它是一个过渡性的文学史概念，任何时代的文学都曾经作为“当代文学”存在过，比如唐代文学对于唐人来说是当代文学，宋代文学对于宋人来说也是当代文学，在这个意义上，真的可以说“没有当代文学就没有古代文学”。从时间上讲，一切当代文学都将变成古代文学。我们从事的文学研究，要么是古代文学研究，要么是当代文学研究，要么是过去完成时的古代文学研究，要么是现在进行时的当代文学研究，所以此时的“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之间构成了历史分野，而所谓“现代文学三十年”则将作为“古代文学”的历史延伸而存在。看看钱基博写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就知道了，在他的心目中，“现代文学”正是作为“古代文学”的历史延伸和新变而存在的。

说了这半天，主要是为了表明“当代文学”的概念是不可替代的，而“当代文学”研究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当代文学批评，只有在具体的当代文学批评实践中才能推进正在进行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也只有在具体的当代文学批评实践中才有可能建构出新的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理论。所以，轻视或者放弃当代文学批评实际上是当代学者的失职行为，注定了是不可能在文学研究中有实质性的创获的，这是需要当今的文学研究者深思的问题。

二、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的主观阐释危机

虽然我在前面为当代文学批评的合法性做了辩护，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意识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所存在的问题。在我看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片面的理论崇拜以及由此导致的主观阐释危

机。许多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人，既包括学生也包括教师，很少或基本不阅读当代文学作品，即使阅读了也是停留在浅尝辄止或浮光掠影的层次，根本没有耐心去做扎实的作家作品论，而轻易地满足于从某种特定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流派出发，从宏观上做出抽象或空泛的文学阐释和评价。在这些人那里，西方现代的每一种批评理论都是作为某种阐释体系而存在的，他们只需要做简单的“拿来主义”，做西方人的理论搬运工，把西方人的批评理论体系拿过来简单地套用，唯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马首是瞻即可，这就是所谓片面的理论崇拜现象。更要命的是，我们在借鉴或拿来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的过程中还有着极度的喜新厌旧心理，一个主义拿来用过之后赶紧丢掉，马上换成另一个主义，于是各种主义就像走马灯一样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舞台上流转不停，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年。当老牌的启蒙主义、自由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还未生根发芽之时，又急剧地流行起庞杂的现代性理论、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民族国家想象理论、疾病隐喻理论等等，由此导致了当代文学批评基本上成了西方现代各种文学批评理论的演习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也就成了一场关于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术语秀”。我们的批评家成了理论的炫技者，成了理论搬运工，我们的眼中只有主义而没有问题，所谓“主义的旅行”在中国终将成为一场闹剧。

显然，这里存在着一个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中国传统哲学中讲究知行合一，而在我们当代文学批评领域中，知与行之间是片面的由知来支配行的关系。如果用当今西方的流行理论来说，这就是被动的述一行，不是我述故我行，而是他述我行，是他者掌握着我们行动的权力。在我们的批评家心中，西方的各种批评理论是作为真理而被我们接纳或顶礼膜拜的，尽管西方后现代主义在当代中国已经流行多年，但我们的解构之刀只有在面对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时才能发挥犀利的能量，而在面对西方各种庞杂的现代批评理论时则似乎丧失了批判和反思的能力。本来西方的各种现代批评理论都有着各自的批判性，但一旦被我们拿来之后就日益沦为了僵化的理论教条，我们只知道知识崇拜、理论崇拜、真理崇拜，而缺乏古人所说的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的能力。我们的批评家永远停留在向西方人学习的阶段，而无法超越学习和模仿层次进而抵达创造性的境界。我们

在面对着鲜活的文学作品时，总是容易犯下理念先行的毛病，我们忽视了西方人的至理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当然，文学之树也常青。我们的思维模式重演绎而轻归纳，重本质而轻现象，重理论而轻经验，这实际上是最懒惰的思维方式选择，因为，当我们放逐了活生生的经验和现象的时候，一切似乎都会变得简单，但我们在将问题简单化的同时，也就与真正的真理擦肩而过了。剩下的只能是作无止无休的阐释，而且是在西方人现有的理论框架内来进行阐释，不敢越雷池一步。比这种主观公式主义更糟糕的则是另一种不入流的批评行径，这类批评家对哪一种批评理论都是一知半解，从未做过专门的理论探究，而是以浅薄的“知道分子”姿态随意妄为地“拿来”，由此导致了当代文学批评界的一种恶果，即各种新概念或新名词的狂轰滥炸、泛滥成灾。比如对作品、文本与话语概念的随意混用，对阅读和接受、读者和受众的不分场合和语境的挪用，对语言、言语、符号、能指、所指之类现代语言学或符号学概念的乱用一气等等，不一而足。如此一知半解、囫圇吞枣式的理论阐释，除了带给我们一番所谓视觉的盛宴之外，最终能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留下什么实质性的贡献呢？老实说，许多文学批评文章不过是做着主观阐释与过度阐释的无中生有的游戏罢了。在他们那里，文学批评实际上与文学无关、与作品无关，他们不过是借助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市场贩卖或兜售西方人的批评理论产品而已。

说到这里，我必须为自己辩解一下。我并不是一个简单地排拒西方理论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相反，我在从事文学批评或文学史研究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对西方哲学和文艺理论的学习。我感到痛苦乃至痛心的只是，我们的批评家和文学研究者为什么只能做西方理论的搬运工而缺乏在别人的基础上再创造的能力呢？翻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我们的老祖宗是有文学理论或批评理论的原创力的，中国古代文论显然自成了一套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它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我们不要老是妄自菲薄，完全用西方人的理论体系建构的单一标准来衡量我们中国固有的文论话语体系，而应该秉持客观公正的学术立场清醒地看到，中西文论话语体系各有千秋，也各有流弊。我们虽然不必为黑格尔和海德格尔借鉴过我们的老庄道家哲学和美学就沾沾自喜，但我们确实也不必径直地拜倒在西方文论话语的脚

下，现出一副永世不得翻身的“西崽奴才相”。总之是我们需要创造，需要在学习西方现代文艺批评理论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我们自己特点的批评理论形态。遗憾得很，如果我们回顾百年来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我们很难找出几个能够在借鉴西方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独具风采的现代文学理论的大批评家！我觉得鲁迅算一位，他所开创的以国民性批判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启蒙文学话语，无疑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至今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都还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鲁迅在文学批评理论的建构方面确实用力不多，他主要的精力还是用在了小说、散文和杂文创作上，以及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上了。鲁迅后面有胡风，胡风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建构是建立在鲁迅的中国式现代启蒙文学话语的基础上的，胡风的文论是对鲁迅文论的继承、发扬和完善，本质上一脉相承，大体上属于同一种性质的现代文学批评理论体系。悲哀的是，近三十年来我们已经找不到鲁迅和胡风这样的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大师了。真是应了《风波》里九斤老太的话：一代不如一代！一方面我们彻底摒弃了老祖宗的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另一方面我们又缺乏批评理论的创造力，我们只能在西方人面前摇尾乞怜、拾人牙慧。什么时候我们也能产生属于自己的“别车杜”呢？什么时候我们也能产生属于自己的巴赫金和萨义德呢？还有，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再产生鲁迅和胡风这样级别的大批评家呢？我想，如果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的这种主观阐释危机不解除，我们就无以产生自己的批评大师。因为我们的批评家根本不从活生生的文学创作实践中去发现问题并寻求自己的解释，而是满足于直接套用西方的批评理论进行主观阐释，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不是我在阐释，而是我被阐释了；不是我在批评，而是我被批评了。不是批评家在阐释文学作品，而是西方理论在阐释着我们的批评家，就这样，我们的当代文学批评沦为了低层次的再阐释！

如果我们翻看一下《胡风全集》就可以得到珍贵的启示。作为中国现代最有理论成就的文学批评家之一，胡风所致力于建构的中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并非向壁虚构：一方面，他努力向西方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派别学习，而且还吸纳和融合了精神分析学等现代主义文艺理论的营养；另一方面，他更善于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去提炼和营构适合于

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实际情形的文学批评理论元素，如“主观战斗精神”、“精神奴役的创伤”等概念的提出都闪烁着胡风独特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光芒。我们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对鲁迅、路翎、艾青、田间等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及其作品的深入评论，胡风还能建构出属于自己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同样，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俄国大批评家的威名，也是与他们各自充满力量的作家作品论和文学思潮论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没有从理论教条出发，没有犯主观公式主义的错误，他们立足于具体的文学现象，驾驭理论和提炼理论，而不是简单地拿来理论套用，终至被理论所束缚。所以他们的文学批评中不会有我们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常见的主观阐释泡沫，更不会有过度阐释的批评秀。即使以近年来在我们当代文学批评界经常援用的一些理论大师为例，我们也可以得到同样的启示。众所周知，本雅明的文学批评理论是与他“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波德莱尔的深入研究分不开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诗学是与他“荷尔德林、里尔克等优秀德语诗人的具体诗歌作品的深度感悟分不开的，巴赫金的文学批评理论如狂欢化理论和复调小说理论，是与他“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的小说专题研究分不开的，苏珊·桑塔格的疾病隐喻理论是“与她大量的经典文学作品中的疾病，如肺结核、癌症、艾滋病等的文学书写的考察分不开的，而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也是与他“狄更斯、简·奥斯汀、康拉德等人的具体作品研究分不开的。所以我们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学习这些西方现当代批评大师对文学批评实践的重视，不要輕易地割裂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关系，要知道只有建立在文学批评实践基础上所产生的文学批评理论才具有真正的原创性，才具有真正的阐释力量！

无奈我们置身在这样一个浮躁的年代和助长浮躁的学术体制之中，许多人沉醉在主观阐释和过度阐释的文学批评陷阱中不思自拔也无力自拔。长此以往，我们不仅无从产生自己的大批评家，更无法产生具有原创性的中国化的当代文学批评流派。想想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界，那可真是群星闪耀，交相辉映，单个的大批评家与群体的批评理论流派之间相得益彰。存在主义文论、精神分析文论、神话原型批评、法兰克福学派文论、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文论、女性主义文论、西方马克

思主义文学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随便哪一种文学批评理论流派，都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学派史，既有一以贯之的理论视角和理论线索，又有不同阶段的不同理论侧重，如同一棵参天大树不断地成长壮大，枝繁叶茂。而反观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界，无论单个的批评家还是群体的批评理论流派，其差距何止霄壤！我们当代的文学批评家总是难以摆脱那种猴子掰包谷式的心态，对西方的各种主义拣一个扔一个，或操练或玩弄、喜新厌旧，最终一无所获。三十年来，我们没有看到哪一种西方现代的文学批评理论流派在中国真正地做到了落地生根并开花结果的，我们只有阐释而且是被动的阐释，我们无力将西方的批评理论结合中国文学的实情再往前推进一步，乃至形成类似于中国化的存在主义文论、女性主义文论或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文论，我们似乎丧失了开宗立派或者别开生面的能力！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同样流派纷呈，但拔剑四顾心茫然，放眼国内主流文艺理论界和批评界，又有多少真正能创建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流派的迹象呢？就连海外华裔的文学批评家中，我们似乎也很难看到中国化的理论声音。想想萨义德和斯皮瓦克，这两位亚裔学者，分别来自中东和印度，但他们在美国的语境中都开创了新的批评理论派别，而华裔学者中，恕我孤陋寡闻，我还真的没有听说有谁在海外独创出了某种被世人广为追随的批评理论。凡此种种，无不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实践工作和理论建设同样的任重而道远。

三、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实证精神与方法

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走过了六十年的历程。实际上，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性质的研究模式，即作为文学批评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作为文学史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从理论上讲，这两种性质的当代文学研究模式之间应该是互补互渗的，两者各有侧重，但又彼此融合，这才是健康的当代文学研究生态。正如我在前面所说到的那样，文学批评、文学史与文学理论这三者之间并非绝缘或割裂的关系，而是一个文学研究的有